陪客

梅桑榆

請客的人不是因你而擺宴，而你卻應邀在座，你就是一名陪客。於宴席之上，陪客與主客喝的是相同的酒，吃的是相同的菜，並且可以藉機結識新朋友或拉上新關係，而吃飽喝足之餘，又不需爲主人的破費而心痛，大不了下次請客時，順便邀他做一次陪客，也就還了吃請的情。做陪客眞是樂事一樁。

然而，做一名陪客赴宴，並非僅帶一張嘴和一個胃即可，在與主客同享口福之樂時，還需懂些人情，通些世事，在舉止應對上把握一點分寸。在咱中國禮儀之邦，座次的安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別說在那些公衆場合，即使在私家宴會上也不可忽略，故入席落座時需聽從主人的安排，不可隨心所欲。如果主客稍一推讓，你便當仁不讓地坐上他的位子，或是你本應叨陪末座，卻在餐桌的上首落臀，就可能讓主人尷尬，甚至毫不客氣地請你坐到你應坐的地方。有一次，我一年輕朋友戀愛有成，特邀女友的父親與他的父母一聚（家鄉稱這一聚爲「會親酒」），我也應邀前往陪客。朋友的未來岳父聽說我是作家，入席時客氣地拉我坐在他的旁邊。我不知是敬，也未推讓。待到大家坐定，一同擎杯舉箸之時，我才發現我犯了個錯誤——我坐在了首席，也即坐在非他莫屬的位置上。由於我插足其間，使得兩位「親家翁」談話碰杯，多有不便。我也如芒刺在臀，很不自然。但此時再易位而食，顯然不妥，我只好硬着頭皮，把喝酒進行到底。自那以後，我在充當陪客之時，首先注意的便是自己應該坐在哪裡。

做一個陪客，並非只要坐對了位置，便算盡職。既是陪客，就有「陪」的義務，席間要與請客者一同對主客表示熱情和敬意，或是談些軼聞趣事與大家感興趣的話題以烘托氣氛……有些人卻置這些應酬的常識於不顧，或旁若無人，箸不停揮，只顧吃喝，一副饕餮之相；或大發牢騷，猛訴冤屈，誤把宴會當成了訴苦會；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誤把酒桌當成了演講台……結果不是喧賓奪主，冷落了主客，就是弄得滿桌客人無以置喙，只能呆坐一旁，充當一言堂上的聽衆。有一次，我一朋友因搞調動，請一位能幫忙的人吃飯，我應邀陪客，席間另一位也屬陪客的老兄聽說主客有些職權，幾杯酒落肚，竟向他大訴其苦，說自己在單位如何受歧視、受壓制，總之是懷才不遇，壯志難酬。我的朋友幾次設法岔開話題，均未能使他關上那苦水滔滔的閘門，後來這位老兄竟問主客，是否也能幫他換換單位，這一要求不僅使那人面露難色，我的朋友也終於不得不制止他的發言。不料他竟未等席散，便提前告辭，以示抗議。又有一次，我的一位亦商亦文的朋友宴請他的一位大學同學，請我去做陪客。席間，一位只與我的朋友見過第二次面，也是陪客的仁兄，知道我的朋友亦商亦文，已出版幾部小說與詩集，便無休無止地談文學、談哲學、談社會、談人生（其實都是對不同的人說過的老話），雖美酒佳餚，也不能堵住其口，結果滿桌客人只能恭聽他的滔滔宏論。當我朋友的太太說起他們夫妻之間最近鬧了一點矛盾，讓大家評評誰是誰非時，這位仁兄又大談夫妻相處的藝術，談情愛性愛，並將薩特與波伏娃的關係稱爲男女關係的最高境界，建議我的朋友和太太向他們學習，後來又說是「距離產生美」，建議朋友夫妻分居一段時間，甚至說自古詩人多放浪形骸，鼓勵我的朋友生活上開放一些、放蕩一些，說是這樣才能靈感豐富，不斷產生創作的激情……我的朋友倒是能面帶微笑，從容地當他的聽衆，他那本來談笑風生的太太，臉上卻漸漸露出冰霜之氣。而這位仁兄仍談興不減。諸如此類的陪客，豈不有點讓人畏懼？

說古人的字與名同

馬斗全

一般讀者都知道，古人名之外，又有字，即現今所謂表字，許多讀者還知道字與名每有一定關係，但卻少有人知道，古人有字與名相同的。

《南史》即載，曾兩任宋之吏部尚書的蔡興宗，字興宗。幼有神童之譽後爲詩人學者、頗受梁昭明太子禮遇的劉孝綽，字孝綽。酷愛讀書且著述頗豐、官至尚書左丞的王僧孺，字僧孺。皆字與名同，或曰以名爲字。還有江德藻等，也以名爲字。唐宋以至明清，均有以名爲字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即記其讀書所見：「楊昇庵《詞品》六卷，補遺一卷，中記劉子寰、馬子嚴、馮艾子，皆以名爲字。」清代有位女子徐昭華，曾撰《徐都講詩》一書，字昭華。

蔡興宗本傳載：「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己風。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是其父蔡廓寄厚望於兒子，所以名與字俱爲「興宗」。

對於這種字與名同或曰以名爲字的情形，難免有人會問：那不是多此一舉嗎？非也，其實並非「多此一舉」。即如蔡興宗，字興宗，除表明重「興宗」二字外，還可給人以方便。古人之習，對人稱字不稱名，以示尊重。若因字與名相同而省去「興宗」之字，即沒有字，則別人不便稱其名「興宗」。而同時有「興宗」之字，別人便可稱「興宗」。可知有與名相同的字，與無此字，其實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種情況，是以字爲名。顧炎武《日知錄》即云：「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並以字爲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又有以字行者，也類似於這種情況。如《全唐文》載：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唐才子傳》載：朱慶餘，字可久，以字行。至當代亦然。已故學者孫玄常，名功炎，以字行，今之中鎮詩社詞人王蟄堪，名景泉，亦以字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天祥本爲其字，後以字爲名，改字履善，中舉後又字宋瑞，則屬另一種情況。

人間有味是清歡

馮進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汪曾祺還是年輕人的時候，曾在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大讀書。抗戰烽火之中，民族危亡之際，有這麼一所流亡大學，薈萃當年各學科鼎鼎大名的精英教授和莘莘學子，留一點讀書的種子，存中華文化之一脈，也是我們後人的福氣。汪曾祺並不是個太用功的學生，朱自清的「現代文學」他常常缺席，惹得朱先生大爲光火。不過沈從文非常賞識他，曾說他教的「寫作」汪曾祺可以直接免修拿優。而汪曾祺，也對沈氏提出的對生活要「溫愛」，而不是「熱愛」的說法大爲贊同。這樣一種對平淡人生的細致品味，對人情百態的悲憫與享受，正是汪曾祺文字的獨特魅力所在。

汪曾祺的文鮮有從頭至尾完全不涉及食物的。但他的美食文中，最動人的是有關他故鄉的回憶。譬如他的成名作《受戒》，描寫了一個叫明子的小和尚與一個叫小英子的小姑娘的青梅竹馬的情意。文中有這樣一段：

「秋天過去了，地淨場光，荸薺的葉子枯了，——荸薺的筆直的小葱一樣的圓葉子裡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嘩嘩地響，小英子最愛捋着玩，——荸薺藏在爛泥裡。赤了腳，在涼浸浸滑溜溜的泥裡踩着，——哎，一個硬疙瘩！伸手下去，一個紅紫紅紫的荸薺。她自己愛幹這生活，還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腳去踩明子的腳。」

文中寫的是平凡瑣碎的細節，談到的食物也沒什麼出奇，可是襯着樸素的民俗風情，眞切的人物素描，一股輕靈流動的文氣撲面而來。其中疊音字和象聲詞的運用，長句短句的交叉，以及對方言詞和文言結構的靈活調度，更是讓人如聞天籟之音。

又譬如，汪曾祺在《三姊妹出嫁》中寫了靠一副「餛飩擔子」養大了三個女兒的秦老吉。作者筆下生花，寫出來眞是美食美器。

「這副擔子非常特別。一頭是一個木櫃，上面有七八個扁扁的抽屜；一頭是安放在櫃裡燒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銅淺鍋。銅鍋分兩格，一格是骨頭湯，一格是下餛飩的清水。扁擔不是套在兩頭的櫃子上，而是打的時候就安在櫃子上，和兩個櫃子成一體。扁擔不是直的，是彎的，像一個羅鍋橋。這副擔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細巧玲瓏，很好看。這好像是《東京夢華錄》時期的東西，李嵩筆下畫出的玩意兒。秦老吉老遠地來了。他挑的不像是餛飩擔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麼文物。

別人賣的餛飩只有一種，葱花水打豬肉餡。他的餛飩除了豬肉餡的，還有雞肉餡的，螃蟹餡的，最講究的是薺菜冬筍肉末餡的，——這種肉餡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剁的！作料也特別齊全，除了醬油、醋，還有花椒油、辣椒油、蝦皮、紫菜、葱末、蒜泥、韮花、芹菜和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餛飩分別放在幾個抽屜裡。作料敞放在外面，任憑顧客各按口味調配。

他的器皿用具也特別清潔——他有一個拌餡用的深口大盆，是雍正青花！」

在這樣的擔子上吃餛飩，我們品味的不光是美食，更是文化、歷史，和細微卻眞實，於我們息息相通，血肉相連的人生了。

（《汪曾祺美食美文》之一）

萬隆的書店

東瑞

一個印尼的小小山城，一家叫「東方書屋」的書店生存了近十年，不免引起了我的好奇。尤其當我知道書店總經理洪念娟與我同鄉，還寫得一手好文章時，更令我大感興趣。此番小遊萬隆，參觀探訪「東方書屋」便是我的重點節目之一。它還是萬隆唯一的華文書店哩。

印尼禁止華文長達三十幾年，解禁是一九九九年的事。不用說，大家都知道，讀者非要在五六十歲以上不可了。這樣的限制，必然令生意極難做；是什麼樣的信念和勇氣令出資人如此堅持不懈？這家「東方書屋」據說還是萬隆的唯一；印尼華社雖基本上屬「男權社會」，但女性近年出色者大有人在，她們經濟獨立，做什麼行業的都有，但與書店沾邊的絕少。是怎樣的興趣和動力讓這位洪女士在書屋當總經理坐鎮？大半年前曾與她在印尼小城蘇甲巫眉一個極度偶然的場合匆匆交談，但連臉面都未曾瞧個清楚。別後時有短訊往還，泰半是自嘲幽默戲謔玩笑一類文字，有時玩玩猜謎，她十有其九均猜中；有時在文字中鬥智鬥嘴，都是她勝我輸。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想「指正」她，說她怎麼將「才貌雙全」用在男性身上？她手機馬上傳來：「《醒世恒言》高家新女婿才貌雙全……《清平山堂話本》孩兒見他文章絕代，才貌雙全，必有榮華之日；《惡俗篇》：一位才貌雙全的才子……所以這並非女子專用。」這愈令我不敢小覷她。心想那麼好勝又認眞的女性在我所遇到的人中還是比較少見。至少也是一隻女書蟲吧？

我們先到首都雅加達。那日動身前約好，她會在書店門口等，有些她託的書要先交予她。車程近三小時，臨到時又再撥一次電話，才知書店幾經變遷，已遷至印華資深名譽主席李順南經營的「伯達那維沙達」酒店對面的一條橫巷內。遠遠看到巷口高空掛着一個有關「東方書屋」的紅色指示牌。記得多年前來萬隆，就在酒店對面的咖啡店喝過奶啡和吃過麵。想不到該店也遷到書屋斜對側。念娟在我們走那天，還請我們在小店吃麵，果然別有風味。「東方書屋」樓高三層，底層門面爲玻璃門，牆上掛有書法名家題贈的書法，如「書到用時方恨少」「弘揚華夏文化」等。兩張辦公枱擺在最裡面的樓梯轉彎處。與香港書店的擺法的最大不同之處是，書都站列在幾個大書架上，而書架高過人頭，中間兩長排，兩邊牆也都設架，書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一本書是平擺的，這就給書屋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走廊之寬至少可以並列站立三至四人拍照。二樓仍有少許書架，主要擺一些成盒成套的電視劇，中間擺沙發等傢具。

初次近距離見書屋總經理洪念娟，便有一種一見如故的親切感。她腳上穿着涼鞋，下半身着膝高的緊身黑褲，上身是寬鬆的白色花領的灰藍色上衣，一頭烏黑披肩長髮。一見我們，熱情招呼，動作勤快，顯見一派豪爽之風。這樣一副快人快語的作風，不易教人猜到她的年齡。我猜想應是比她的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吧！要是她不在書屋出現，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成功地開過成衣廠、相館、餐廳、香波廠，曾經如何地精明強幹；她還在音樂、舞蹈界十分活躍；然而此時的她文靜溫情，並不覺得她與書屋有什麼不諧調。如果我們了解到她參加幾度徵文比賽都獲了獎，那就會太驚異了，怎麼不同的才幹和智慧都能集於一身。我眞的很難想像一個書屋總經理，竟有着那樣豐富的經歷。

六年了啊！六年歲月不尋常。早在此次探訪書店之前，了解到書屋的艱難發展。最初阿娟(她要我們這樣稱她)只是在書屋幫忙記賬，書屋幾度虧蝕，「幕後英雄」林叔和江叔見她愛書，又肯幹，始終不離不棄，那麼地堅持，就決定辦下去。書店從早上八九時開到傍晚六時，做經理的這六年來，阿娟有事沒事都要在每天中午前來書屋，一直耽到書屋休息。書屋請有一華人和一友族女職員。我曾問過，老闆是否爲了盈利才開辦書屋，阿娟搖搖頭。這就跟我當初的猜測估計相近，說來說去，無非是弘揚華夏文化，爲了愛書人讀書、找書的方便。不難設想，一旦書店的經費都虧蝕光，不得不「結業」就意味着什麼了。那就意味着，萬隆這座全印尼第四大城市、亞非會議曾於五十年代在此舉行的地方，連一家小小的華文書店，都不存了。這是多麼叫人悲哀的事情！從五十年代迄今，華人已歷經三代。老一輩已在五十餘、六十歲以上，他們懂得華文，但下來的中年、青年完全斷了層，剛出生至十餘歲的，縱然已在學華文，但還未成長。比諸香港，書店的經營更增加了一份難度。

租金成了首個難題，因爲無論書的銷售情況如何，租金「照走」。這一如香港一樣，雖然，萬隆的租金比香港低，但華文教育環境完全不同。

我環視書屋的書，以中國大陸的爲多，兼及香港和台灣，以書封底打的印尼盾定價，並未見得昂貴。譬如，香港圖書的定價基本上照比率換算成印尼盾，而中國大陸圖書的定價也算正常。

假使到中國大陸旅遊時順道買書，不是還得計算攜帶、運輸等等費用嗎？再將書屋轉了幾大圈，慢慢「橫掃」，抽樣看看，什麼都有哇：文學、歷史、烹飪、園藝、育兒、華文教科書、政治、經濟、醫療……甚至一些在香港未必容易見到的大陸圖書都有。文藝，有純文學，也有流行的言情小說。我翻了一本又一本，忽然看到了一本璩美鳳的回憶錄，那麼偶然，一年前不是見到她在電視上的受訪嗎？問阿娟，此書她也讀過。我說，不管怎麼說，女性的生存眞艱難啊。

對於東方書屋，眞有一份難捨的感情。那大概是因爲多年前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夢想，想在香港開一家書店門市，但一直缺乏此種勇氣。比起東方書屋幕後兩位老前輩，我們是自嘆弗如的。我也欽佩阿娟，把她六年來的大半天獻給了書店文化，默默地守着一片美麗溫暖的文化方土，同時浸淫其中，涵養出與一些人不同的學識和氣質，她的直爽性情，她所擁有的，都是漫漫歲月對她最好的報答吧！

印尼萬隆東方書屋，中立者為書屋主人洪念娟

美麗的脈動

冬泉

今天，風能、太陽能已被視爲最值得開發的清潔能源。其實，早在古代，世界各地就有風車、風帆，人類也早早懂得把冷水曬熱，用來洗澡和洗衣。只是今天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很多現代化大樓的太陽能裝置已在提供冷暖空調的電力，而在一些風區漫山遍野的風車轉動，更蔚爲奇觀。

但令筆者怦然心動的，卻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疆往事：所在礦區也曾利用過太陽能。當時，職工洗澡遇到了難題，先是鍋爐質量不好，安裝後故障多多，維修人員技術也不過硬，等到問題得到解決，又碰上燃煤供應短缺。開發礦業本是一份骯髒、勞累的重活兒，加之地處飛砂走石的戈壁灘，人們洗不上澡比吃不上新鮮蔬菜更受折磨。漸漸，人們對洗不上澡已習以爲常，不再埋怨，而內心的委屈則不知不覺加深了多個等級。就在這時，名叫凌才、居抗和朱海日的三位上海支邊青年，據一本過期的科技畫報「照貓畫虎」，在礦區澡堂房頂上搭建太陽能熱水器。他們忙碌這件事時，礦區領導好像並不知道，只是得到基層小組長「姑且一試」的認可。但沒想到，這番努力卻決解了全礦頭疼不已的洗澡難問題。方便、廉價、美好。這就是當時人們對太陽能的最眞切感受。

世間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人對大自然資源的思考。一個好的理念、一種優秀的設想，爲人類自身創造的幸福，絕對超過風調雨順或冬暖夏涼的「餽贈」。但最關鍵的，仍是具體的人和群體，要想得到，要權衡，要選擇，要行動，更要實現。說回當年新疆礦上，多少人只知在骯髒中仰天長嘆，眼睛被太陽光刺痛，而腦海裡壓根兒就沒想到，恰恰就是這陽光，就可以讓令人望眼欲穿的礦區澡堂重開。也許，人們的抑鬱無爲也是大自然的力量使然。但三位知青用行動改變現實的痛苦，而他們純潔心靈的執著、與人爲善的精神動力，分明也是大自然的一種神秘而美麗的脈動。

咬文嚼字滋味長

朱國良

一、老俗語

酒是陳的好，茶是新的香。這兩種物質的特性似很有哲學的品味。兩者同時要具備這種味兒似不大可能，尤其是物質的東西。但只有俗語，流傳民間之久，傳播江湖之遠，翻出運用之新，講出胸襟之意，散布新茶之香，足顯老酒之醇。雅人們愛說：人生是一張單程車票，一去而不復返。這意味是深邃的。但俗語講：人生好比抹桌布，甜酸苦辣都嘗過。這土得如泥巴，俗得像飯碗的話語，不是也很有滋味麼！說到小人，孔夫子講「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曹雪芹藉人之口說：「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民間老百姓的口語則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這話比曹雪芹的詩還節省兩個字，但飽含深意，可資鑒戒，且還琅琅上口，甚至可比警示的語錄。

話及有的人「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帳子面孔陰陽臉，當面背裡各不同。白居易詩曰：「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巧言直如簧」。但俗語的表達則更直接，有此一說：「說得蠻好聽，棺材毛竹釘」。過去人死落棺，你還用毛竹作釘，這不是不實不誠得可以了吧！對講信用的重要，外國人說：你的檔案在別人心中。文人們搬來成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類文皺皺的東西，俗話只是一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便全部概括了。俗語的精品多了，喻頭腦活絡，做事靈活，人們會說他是「棺材劈開賣，生意活絡做」。形容現今老實人吃不開，機巧之人手段活富起來，我們又會說上一句：「田螺發呆，泥鰍發財」。講到創業的艱辛，生活的不易，老輩人又會總結道：「頭上不起塊，本事學不會」……

這方面的俚語「民」言眞是燦若星辰，不少精品妙句大有「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的妙處呢！對於我們領會什麼叫大音希聲，大智若愚，我看也可從俗語中尋找一些註解，借用一點營養。

二、雙關語

何謂「雙關語」，就是話中有話，弦外有聲，暗藏機鋒，隱晦曲折。說它是話語裡有骨頭，似是硬了些，講它是挑燈猜謎多曲徑，好像又文了點。但「雙關語」者，總的說來需要仔細嚼一嚼，其味正在細嚼慢嚥之中呢！有一個川劇叫《秋江》的，裡面的老艄公問前來搭船的女尼貴姓，妙常故意說「姓陳」，艄公忙令住口，因爲舟行江中，最怕就是這個字——沉。《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愛新覺羅・溥儀三歲登基，大哭大喊，其父攝政王說：「別哭，別哭，快完了，快完了！」這引得文武百官心中嘀咕：認爲乃不祥之兆，怎麼能說「快完了」呢。這些諧音的雙關語，顯然有着迷信的色彩，雖說姑妄聽之可也，但作爲有心人，也能悟出些東西來。雙關語，古已有之。六朝的樂府民歌有「銜碑（諧悲）不得語」，「夜夜得蓮（諧憐）子」，「晝夜長懸絲（諧思）」，「藕（諧偶）異心無異」之句。宋朝有民謠曰：「打破筒（諧童貫姓），潑了菜（諧蔡京姓），便是人間好世界」。《紅樓夢》中有的《護官符》的假與賈諧，雪與薛諧，也是妙趣橫生。語言運用是一門藝術，雙關語也最能發揮國人的幽默和風趣。「文喜看山不喜平」，寫作中，如此「曲一曲」，讓人「品一品」，令人「笑一笑」，感覺「新一新」，自有一番藝術感染力。要不然，雨果怎麼會說：「雙關語是飛舞着的靈魂的產物」呢！

日佔時期的一片蕭條

艾京

日本南侵後，印尼居民人心惶惶，不少有條件的華僑家庭，爲避免日本軍機狂轟濫炸，紛紛從城市逃到偏遠地區。可能對戰爭的後果認識不足，也可能對日本人的殘暴性估計不足，人們只顧逃命，沒想到囤積生活用品，因此市面上反倒很平靜，沒有出現搶購現象。在日本軍政府下令對大米及日用品實行管制後，大家才傻了眼，但爲時已晚。原先燈火輝煌的夜市，不到晚上六點便紛紛「打烊」。由於與世隔絕，原先從荷蘭、英國進口的舶來品已斷市。在荷蘭殖民地時代，印尼的工業用品都是靠進口的，就連牙膏、牙刷和香皂，也幾乎全靠進口。即使有中國商人設廠生產洗衣肥皂，也因材料短缺而停止。

在市面一片蕭條中，出現了千奇百怪的日用品。例如所謂肥皂，就是用燒成灰的椰殼或稻草，提煉出鹼來製成的土肥皂，用時滑溜溜的，但不見有什麼泡沫。人們用以代步的腳踏車輪胎也出現了危機。由於橡膠屬戰略物資，新的內外輪胎限制供應，貴得令人卻步。於是頭腦靈活的中國人便收購廢置的汽車舊輪胎，熔化後製成大小規格不同的實心自行車輪胎，走起來硬邦邦。由於年久失修的馬路凹凸不平，實心車胎往往「脫框而出」，摔傷人的事件頻頻發生。前文提到的再生膠紗籠也是在這個年代的產物。

日本人爲了麻醉市民，顯示「大東亞共榮圈」的「繁榮」假象，允許中國人在某些大城市開放賭場，同時批准成立兩個劇團，一爲以印尼文對話的「菲菲・楊劇團」，將俄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曹禺的《雷雨》改編成以印尼社會爲背景的多幕劇，並自編自演反映賣淫女悲歡離合的多幕劇《紅橋》，由印尼華裔影星楊菲菲及其印尼養女達莉婭擔當主要角色；另一以華語爲對話的「新地劇團」，其策劃人爲日本軍部的翻譯官金重伯勳，以《雷雨》、《日出》和俄國果戈里的《欽差大臣》爲主要劇目。金重本人爲台灣客家人，中文名爲鍾伯勳。一九九〇年我與妻到台灣特地拜訪年過八十的鍾老。他不隱諱地告訴我，當時他是地下反戰同盟的成員，在日佔台灣時借到曹禺的劇本，一讀之下不能釋手，遂將劇本排成戲演出。演出時，所有入場券都由軍政府派發。

日本人爲了表示「友善」，關閉了所有荷蘭學校，但向華校三令五申復課。他們首先把關在集中營的華校校長釋放出來。另一方面審查所有中文教科書。到開學那一天，日本軍政府派代表監督開學，並派日軍的家屬擔任日語教師，每人向日本人宣讀「盡忠」的誓詞。當時我小小的心靈油然產生當亡國奴的悲哀。以前叫「國文課」的，當時卻變成了「尺牘課」，通篇文言文令我們這些從未接觸過文言文的華僑子弟感到極爲吃力。而練習本由原先雪白的紙張變成又黃又粗糙的草紙。這時市面再也見不到半片白紙，只有日本人「御用」的中文印尼文的日報除外。當時印尼的商業活動幾乎停頓，但「渣突」（即投機倒把）及舊傢具古董市場卻極爲紅火。日本軍官佔了荷蘭人的豪華住宅，作爲一介武夫，他們根本不懂荷蘭人珍藏的古董、傢具的價值，便一古腦兒拉到舊貨商場變賣而從中牟利，不少價值連城的中國的古瓷花瓶及名畫都因此而流失。

《印尼華人滄桑系列之五》